

## 齐、梁朝藏书文化评析

廖铭德

**摘要:** 齐、梁朝藏书文化在王室政权及文化士人的倡导和实践下,与文史学互为动因,极大地推动了古代藏书事业的发展。在思想领域里,儒学、佛教、玄学三教授引并存,形成了多元的社会思潮格局,也为齐、梁朝藏书文化活动提供了良好的社会人文环境。

**关键词:** 齐、梁朝; 藏书文化; 人文精神; 评析

**中图分类号:** G2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17(2008)01-0040-06

齐、梁朝是魏晋以来文化最为繁盛的时代,齐、梁王室对文化的大力倡导推崇为齐、梁藏书文化的兴盛提供了原动力。这一时期,涌现出众多的藏书家,藏书数量丰富,并且在其藏书文化活动中,王室及文化士人表现出我国古代藏书文化“仁爱”“平等”的人文终极关怀。齐、梁藏书文化从属于时代的文化实体,又反映其文化活动和学术成果。鉴于文化概念的广义性、复杂性,作者把齐、梁藏书文化界定在齐、梁朝王室藏书活动、私家藏书活动与社会思潮、文史学等互动影响之间。

### 一、齐、梁朝王室藏书文化的兴盛

公元 479 年,齐高帝萧道成废宋顺帝,建国号齐,史称南齐。南齐承袭刘宋旧制,设省总明观,<sup>①</sup>供学士司职,整理典藏秘阁四部图籍。齐高帝诏东观学士参照曹魏《皇览》编撰类书《史林》30 卷。齐永明初(483),王室大力倡行文化教化,司徒竟陵王子良开西邸,广纳文人学士,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萧衍、任昉、陆倕齐聚门下,号称“竟陵八友”。此外还有刘绘、陆慧晓、王僧孺、孔休源、江革、范

缜等学士。学士司职由此进入繁盛,学士主要职责为撰写郊庙雅乐歌辞,修礼,著书、抄书等。《南齐书》载:“竟陵王子良,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sup>②</sup>学士参与著书,开魏晋南北朝学士著书之风。永明三年(485 年),南齐武废总明观,“是岁,以国学既立,省总明观,于俭宅开学士馆,以总明四部书充之。又诏俭以家为府。”王俭府内一时成为南齐的藏书与学术中心。<sup>③</sup>齐永明中,秘书丞王亮、秘书监谢朓整理官府藏书,撰成《秘阁四部书目》,著录图书 18010 卷。《隋书·经籍志》云:“齐永明中,秘书丞王亮、监谢朓,又造《四部书目》大凡一万八千一十卷。”<sup>④</sup>

天监元年(502),梁武帝萧衍(464-549)代齐,下诏向民间求书,设“秘阁”藏书之外,还增设文德殿、华林园、东宫三地。梁朝掌管典籍机构由秘书监改称“秘书省”,置监、丞各 1 人,秘书郎 4 人,掌国之典籍图书。另有著作郎 1 人,佐郎 8 人,掌国史,撰起居注。秘书丞王泰之请求校定缮写官府藏书。“齐永元末,后宫起火,延烧内秘阁书,图书散乱。

① 元嘉十六年(公元 440 年),宋文帝在儒学、玄学、史学三馆外,立文学馆。宋明帝泰始六年(470),设立总明观,又称东观,总明观置祭酒、访举各 1 人,分儒、道、文、史、阴阳五科,每科置学士 10 人。

收稿日期: 2007-06-15

作者简介: 廖铭德(1967—),湖南永州人,韶关学院图书馆员,韶关学院学报兼职编辑,主要从事图书馆学及历史文献研究。

② 萧子显《南齐书》,卷 40,《竟陵文宣王子良传》,中华书局,1974 年,第 693 页,

③ 王俭(451-489)字仲宝,琅琊临沂(山东)人,宋废帝元徽元年(公元 473 年),为秘书丞撰目录《元徽四部》,大凡 15704 卷。又撰私家目录《七志》:经典志;诸子志;文翰志;军书志;阴阳志;术艺志;图谱志;其佛道附见,合为九条。

④ 魏征 长孙无忌等,《隋书》,卷 32,中华书局,1973 年,第 907 页。

泰为丞，表校定缮写，高祖（梁武帝）从之。”<sup>①</sup>命张率等人主持抄写甲乙两典籍，又抄丙丁二部图书，敕到洽抄甲部书12卷。秘书监任昉也受命搜集图籍，又在文德殿整理藏群书，广收异本，手自校讎，刘孝标、殷均、贺纵等人参典校，成书目23106卷。“齐末，兵火延烧秘阁，经籍遗散。梁初，秘书监任昉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内，列藏众书，华林园中，总集典释，大凡二万三千一百六卷，而释氏不预焉。梁有秘书监任昉、殷钧《四部目录》。又有《文德殿目录》（书目四卷，刘孝标撰），术数之书，更为一部，使奉朝请祖暅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录》。”<sup>②</sup>命学士徐勉等编纂《华林遍略》700余卷。“詹事徐勉举刘杳及顾协等五人入华林撰《遍略》。”<sup>③</sup>“天监十五年，敕太子詹事徐勉举学士入华林撰《遍略》，勉举思澄、顾协、刘杳、王子云、钟屿等五人以应选。八年书乃成，合七百卷。”<sup>④</sup>《隋书·籍志三》著录《华林遍略》620卷。此外，还有梁昭明太子的《东宫四部目录》4卷，刘遵撰。梁武帝不仅重视图籍的搜集整理，还积极倡导文化的传播交流。梁天监四年（506年），武帝诏置“集雅馆”，以招远学，开“士林馆”以延学士，将二馆储部分藏书，供学士研读，派朱异、孔子祛、贺琛等儒士赴馆讲学，武帝也亲临学馆讲经、听讲。《隋书·籍志》序云：“梁武敦悦诗书，下化其上，四境之内，家有文史。”<sup>⑤</sup>一时，梁代学士发展更为迅猛，学士司职由秘书省扩展到东宫、西省、藩王、士林馆、寿光殿、上林馆。普通四年（523），梁萧统置东宫，又敕陆垂、张率、谢举、王规、王筠、刘孝绰、到洽、张缅为学士，史称“昭明十学士”，编撰文学巨著《文选》。刘勰也曾为其东宫通事舍人，深为萧统所爱。“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榷商古今；闭则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sup>⑥</sup>梁大通三年（531）萧统卒，梁萧纲（简文帝）为太子，也置东宫“高斋十学士”，《南史·庾肩吾传》载“在雍州被命与刘孝威、江伯摇、孔敬通、申子悦、徐（摛）、孔铄、王囿、鲍至等撰众籍，丰其果饌，号高斋学士。”<sup>⑦</sup>萧绎（梁元帝）

在江陵，由藩王学士周弘正、彭僧朗、颜之推等校理订图籍，将藏书分为正御、副御、重杂3本。萧绎喜欢聚书，他的《金楼子·聚书篇》中记述了其藏书经过。侯景之乱后，梁元帝入金陵，将文德殿及其他公私藏书七万余卷运归江陵。加上萧绎40年所积藏7万卷，江陵藏书达14万余卷。承圣三年（554），萧簪（昭明第三子）引西魏军攻破江陵，梁元帝恐数十年积累典籍为敌所虏，萧乃入东阁行殿，命舍人高宝善焚古今图书14万卷。魏军于余烬中收拾残局，仅得书卷4000余卷。其他藩王也富有藏书，招学士参与著书。如安成王萧秀“天监初，召（刘峻）入西省，与学士贺纵典校秘书。……安成王秀，好峻学，给其书籍，使抄录事类，名曰：《类苑》，未及成，复以疾去。”<sup>⑧</sup>梁宗室萧机“家既多书，博学强记，”<sup>⑨</sup>萧静“既内足于财，多聚经史，散书满席，手自讎校。”<sup>⑩</sup>萧勔“聚书至三万卷，披习不倦。”<sup>⑪</sup>萧纶“纶举兵援台，乃留书二万卷付枢。”<sup>⑫</sup>萧梁父子为代表的文人，勤于著述，直接促使了整个社会藏书文化的繁荣。如梁武帝撰《史通》480卷、《集》20卷，简文帝《集》85卷，元帝《集》52卷，昭明太子《集》20卷、《文选》30卷等。王世贞云：“自三代而后，人主文章之美，无过于汉武帝、魏文帝者……而著作之盛，则无如萧梁父子”（《艺苑卮言》卷八）。清代学者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在“齐梁之君多才学”词条中评价说：“创业之君，兼擅才学，曹氏父子，固已旷绝百代。其次齐、梁二朝，永不可及也。……至萧梁父子，尤为独擅千古。”<sup>⑬</sup>当是实话。

南齐立国23年，没有梁代的文化积淀，却形成了极盛一时的“永明文化”（483-489），并以王室为中心，向社会各阶层延伸。这与王室对文化的推崇有极大的关系。永明文化实体是由文化士族、王室贵族和寒士文人三个文化阶层组成。虽然经过刘宋至齐寒士上升的军事贵族的残酷打击，但是这些文化士族仍然是社会文化的顶峰。他们有累代的家庭教养，有收藏的典籍与家族文化环境，享有承继文化传统的特权，而且形成了独特的家族文化特色与家族文化传统<sup>⑭</sup>。如王氏（王导、王羲之）王俭的礼治与王僧虔的

① 姚思廉《梁书》，卷21，《王泰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324页。

② 魏征 长孙无忌等《隋书》，卷32，第907页。

③ 姚思廉《梁书》，卷50，《刘杳传》，第716页。

④ 姚思廉《梁书》，卷50，《何思澄传》，第713页。

⑤ 魏征 长孙无忌等《隋书》，卷32，第907页。

⑥ 姚思廉《梁书》，卷8，《昭明太子传》，第167页。

⑦ 李延寿《南史》，卷50，《庾肩吾传》，中华书局，1973年，

第1246页。

⑧ 姚思廉《梁书》，卷50，《刘峻传》，第702页。

⑨ 姚思廉《梁书》，卷22，《萧机传》，第345页。

⑩ 姚思廉《梁书》，卷22，《南平王元伟传》，第350页。

⑪ 李延寿《南史》，卷51，《萧勔传》，第1263页。

⑫ 李延寿《南史》，卷66，《马枢传》，第1907页。

⑬ 赵翼《二十二史札记》，中国书店，1987年，152页。

⑭ 查屏球《从游士到儒侠——汉唐士风与文风论稿》，复旦

书法；谢氏（谢玄）谢灵运、谢朓善诗文；裴氏（裴松之）裴子野撰史著《宋略》；祖氏（祖冲之）祖皓精通数理。他们的家传世学百年不衰，至曾孙、重孙辈仍能继先业。出身于寒士的军事贵族王权，一方面意识到文化教化在政治上、社会人心的感召力与凝聚力；另一方面有着文化自卑的心理，焦虑文化的社会边缘化。因而，王权通过笼络文化士人，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增强王室对文化士人的吸引力，借以巩固自己的政治优势，争夺文化的主导权。也可以解读为王室向文化士族的靠拢、合流<sup>①</sup>。

萧梁王室文化经过“永明文化”的浸染，尽管萧梁仍属寒士兴起的军事贵族，但是本身已具有了一定的文化贵族习气，在篡夺中也多得文化贵族的支持，基本与文化贵族走向了合流。事实上，在梁文化时代，梁萧氏父子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不亚于任何其他文化士人。然而，由于王室文化的先天不足，在审美文化上，又不得不追随文化士族，广纳文人学士掩饰的残余自卑，强化王室文化的虚荣。这一点，梁元帝萧绎表现得十分明显。他的《金楼子》体兼释老玄道，杂糅儒、墨、名、法，涉及古代政治、军事、哲学等十余学科方面知识的巨著，却自负地在《金楼子·立言》篇云：“周公没五百年有孔子，孔子没五百年有太史公。五百年运，余何敢让焉？”<sup>②</sup>侯景之乱，萧绎拥兵自重围剿弟萧纶，坐视父兄建康之围而不救；被西魏军困江陵时，又焚烧了自己苦心经营40年的图籍，曰：“读书万卷，尚有今日，是以焚之”<sup>③</sup>表现出一个不健康的文化人心态，一个自以为是的文化终结者。无怪乎明代藏书家胡应麟发出这样的悲叹：“独湘东（王）以文士甘心焉，罪浮政矣。”<sup>④</sup>

## 二. 齐、梁朝藏书家的藏书活动与精神特质

魏晋南北朝人“富于智慧，浓于热情。”在藏书与文化活动中，文化士人表现出“仁爱”“平等”的人文终极关怀，毫无文人相轻的文化陋习。王室与士人的文化竞争是非对抗性的，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化及思想的多样性具有较大的宽容度。文化贵族之间和对一般文化士人（包括甲族、寒族）之间有着磋商共存、奖掖提携的良好文化氛围。

儒士范缜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无神论者的先驱。在南齐时，当侍竟陵王子良，子良精信释教，而缜盛称无佛。与竟陵王辩论，他把“因果”及人的“贵贱”比作一树花，花落何处纯属自然。对此，子良仅仅是“深怪之”而已。在范缜著《神灭论》后，“此论出，朝野喧哗，子良集僧难之而不能屈。”<sup>⑤</sup>至梁朝，梁武帝笃信佛教，三次舍身入佛门。范缜竟然官至中书郎、国子监博士，老死于任上。相比较，明代文人李贽真是生不逢时。文化名士刘峻（字孝标）“峻率性而动，不能随众沉浮，高祖颇嫌之，故不任用。峻乃著《辨命论》以寄其怀。”<sup>⑥</sup>为安成王秀所赏，“及峻《类苑》成，凡一百二十卷，帝（梁武）即命诸学士撰《华林遍略》以高之，竟不见用。”<sup>⑦</sup>梁武帝也是以撰《遍略》超越《类苑》的正常文化手段。王室藏书与私人藏书始终保持着和谐的文化交流。梁处士阮孝绪撰《七录》就是参考了大量的公私目录而成的。

文化士人之间的人文关怀尤以任昉、沈约二位文坛领袖为代表，一有文才新秀，都会得到他们的奖掖。任昉（460—508）字彦升，乐安博昌（今山东博兴）人，为齐竟陵王子良“竟陵八友”之一，梁初禅让文诰等大多出其手。任昉长于表奏笺序，沈约长于作诗，故有“沈诗昉笔”之美誉。任昉博学多藏书，任梁秘书监于“华林园”整理校讎官府典藏的图书。“自齐永元以来，秘阁四部，篇卷纷杂方手自讎校，由是篇目定焉。……昉坟籍无所不见，家虽贫，聚书至万卷，率多异本。昉卒，高祖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方家取之。”<sup>⑧</sup>撰有《文章始》，其书在隋已亡。《隋书·经籍志》集部总集类云：“梁有《文章始》一卷，任昉撰，亡。”<sup>⑨</sup>今本《文章缘起》为唐人张绩补注，卷首载《文章始序》，清严可均《全梁文》有辑。沈约（441—513）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吴兴）人，历仕宋、齐、梁三朝。“齐初，……直永寿省，校四部图书。……好坟籍，聚书至二万卷，就师莫比。……所著晋书百一十卷，宋书百卷，齐纪二十卷，高祖纪十四卷，尔言十卷，谥例十卷，宋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皆行于世，又撰《四声谱》。”<sup>⑩</sup>如沈约对谢朓的欣赏“二百年来无此诗也”<sup>⑪</sup>。对王筠的厚爱（赠书）“尚书令沈约，当世辞宗，每见筠文，

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05页。

① 查屏球《从游士到儒侠——汉唐士风与文风论稿》，第207页。

② 钟仕伦《金楼子成书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第25页。

③ 钟仕伦《金楼子成书研究》，第25页。

④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华书局，1958年，第8页。

⑤ 姚思廉《梁书》，卷48，《范缜传》，第664—670页。

⑥ 姚思廉《梁书》，卷50，《刘峻传》，第702页。

⑦ 李延寿《南史》，卷49，《刘峻传》，第1220页。

⑧ 姚思廉《梁书》，卷14，《任昉传》，第254页。

⑨ 魏征 长孙无忌等，《隋书》，卷35，第1082页。

⑩ 姚思廉《梁书》，卷13，《沈约传》，第233—242页。

⑪ 李延寿《南史》，卷32，《谢朓传》，第533页。

咨嗟吟咏，以为不逮也。当谓筠：‘昔蔡伯喈见王仲宣曰：王公之孙也，吾家书籍，悉当相与。’约于郊居宅造阁斋，筠为草木十咏，书之于壁，皆写文词，不加篇题。约谓人云：‘此诗指物呈形，无假题署。’……约曰：‘知音者希，真赏殆绝，所以相要，政在此数句耳……约常从容启高祖曰：‘晚来名家，唯见王筠独步’”<sup>①</sup>。对刘勰的提携“既成（《文心雕龙》，未为时流所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于之车前，状若货鬻者。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几案”<sup>②</sup>。对刘杳的信任“杳少好学，博综群书，沈约、任昉以下，每有遗忘，皆问焉”<sup>③</sup>。任昉、沈约奖掖后进的事例《梁书》《南史》有很多记载<sup>④</sup>。王俭、范云、陆倕等也赞赏鼓励后进文士。他们以特殊的政治地位和文化威望，理性地互相推崇、奖掖后进，营造出齐梁文化发展的良好的社会人文环境。

齐梁文化士人在藏书活动中表现出为后世藏书人所钦佩的人文精神。第一，勤于抄书、校书和聚书，扩大藏书对象。如南齐藏书家沈士麟典藏的图籍被火烧掉了数千卷，虽年过80，抄书不止。“手以反故抄写，火下细书，复成二三千卷，满数十篋”<sup>⑤</sup>“緬爱坟籍，聚书至万余卷。抄《后汉书》、《晋书》众家异同，为《后汉纪》四十卷，《晋抄》三十卷。”<sup>⑥</sup>“峻（袁峻）好学，家贫，寄人庑下，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休息……除员外

散骑侍郎，直文德学士省，抄《史记》、《汉书》各为二十卷。”<sup>⑦</sup>“慧斐尤明释典，工篆隶，在山手写佛经二千余卷，常所诵者百余卷。书夜行道，孜孜不息，远近钦慕之。”<sup>⑧</sup>萧静亲自讎校图籍（见上文）。“聚书盈七千卷，手自校治，凡奏议弹文，勒成十五卷。”<sup>⑨</sup>

“僧好坟籍，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与沈约、任昉家书相埒。”<sup>⑩</sup>孔休源整理奏议弹文；王僧孺集18州谱710卷，百家谱集15卷，东南谱集抄10卷，形成了新的收藏特色。第二，爱人爱书，体现藏书人的宽博胸襟。南齐崔慰祖“邻里年少好事者，从来假借，数十帙，慰祖亲自取与，未尝为辞。”<sup>⑪</sup>“峻（刘孝标）家贫，寄人庑下，自课读书。……更求异书，闻京师有者，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谓之‘书’”<sup>⑫</sup>“湛之卒，渊推其财与其弟，唯取书数千卷。”<sup>⑬</sup>“少好学，居贫屋漏，恐湿坟籍，乃舒被覆书，书获全而被大湿。”<sup>⑭</sup>“缵好学，兄有书万卷，昼夜披读，殆不辍手，秘书郎有四员，齐宋以来，为甲族起家之选，待次入补其居职，例数十百日便迁任。赞求不徙，欲遍观阁内图籍。尝执四部书目曰：‘若读此毕，乃可言优仕矣。’”<sup>⑮</sup>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梁处士庾洗。《梁书》载，“庾洗字彦宝，新野（今河南）人也。幼聪警笃学，经史百家无不该综，纬候书射，綦弄机巧，并一时之绝。邻人有被诬为盗者，被治劾，妄款，洗矜之，乃以书质钱二万，命门生诈为其亲，代之酬备。邻人获免，谢洗，洗曰：‘吾矜天下无辜，岂期谢也。’”<sup>⑯</sup>虽然庾洗隐逸不仕、遁世无为，但是他并未漠视人性，以珍藏的图籍质钱，救助他人，反映了率真热情的时代人格特征，也让人感受到处士积极的入世的精神。第三，藏书编目，编纂文集，传承文化。王室书目的编纂总结了前代的文化成果，又引领着社会文化新潮，而私家目录的编纂，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封建王朝循环带来的图书厄运，很多珍贵的图书文献籍此流传。王俭撰私目《七志》，阮孝绪撰《七录》<sup>⑰</sup>。刘杳撰《古今四部书

① 姚思廉《梁书》，卷33，《王筠传》，第484-485页。

② 姚思廉《梁书》，卷50，《刘勰传》，第712页。

③ 姚思廉《梁书》，卷44，《刘杳传》，第715页。

④ “约曰：‘此陛下之大树将军也。’”（姚思廉《梁书》，卷18《冯道根传》，第288页）；“范公好事该博，胡广无以加。”（卷26，《范岫传》第391页）；“约乃谓昉曰：‘此二子（陆倕、张率）后进才秀，皆南金也，卿可与定交。’由此与方友善。”“父党沈约、任昉、范云等闻其名，并命驾先造焉，昉尤相赏好。”（卷33，《张率传》第475-479页）；“昉与革书云：‘此段雍府妙选英才。’”（卷36《江革传》第523页）；“作《鸿序赋》，沈约见之，谓：‘可谓明道之高致，盖通幽之流也。’”（卷35《萧子显传》第511页）；“秘书监任昉方出为新安君，别举诗云：‘讎念耄嗟人，方深老夫语。’”（卷37《谢举传》第529页）；“几为之谏，时年十五，沈约见而奇之。”（卷41《萧綰传》第596页）；“昉曰：‘荆南秀气，果有异才，后仕必当过仆。’”（卷43《刘之遴传》第572页）；“乐安任昉见而称之，当于沈约坐赋得《咏烛》，甚为约赏。”（卷50《王籍传》第713页）；“顾协善为策文，沈约甚为赞赏，谓‘江左以来，未有斯作。’”（卷50《何思澄传》第713页）“沈约见之曰：‘法才实才子。’”（李延寿《南史》卷56《乐法才传》第1389页）。

⑤ 萧子显《南齐书》，卷54，《沈士麟传》，第944页。

⑥ 姚思廉《梁书》，卷43，《张緬传》第492-493页。

⑦ 姚思廉《梁书》，卷49，《袁峻传》，第688页。

⑧ 姚思廉《梁书》，卷51，《刘慧斐传》，第746页。

⑨ 姚思廉《梁书》，卷36，《孔休源传》，第522页。

⑩ 姚思廉《梁书》，卷33，《王僧孺传》，第474页。

⑪ 李延寿《南史》，卷72，《崔慰祖传》，第1772页。

⑫ 姚思廉《梁书》，卷51，《刘峻传》，第701页。

⑬ 李延寿《南史》，卷23，《褚渊传》，第425页。

⑭ 李延寿《南史》，卷72，《虞龢传》，第1770页。

⑮ 姚思廉《梁书》，卷43，《张緬传》，第492页。

⑯ 姚思廉《梁书》，卷51，《庾洗传》，第750-751页。

⑰ 阮孝绪（478-536）字士宗，陈留尉氏（今河南）人，《七录》全目12卷，7大部类，55个子目部，6288种，8547帙，445026卷。内篇：经典录；纪传录；子兵录；文集录；

目》后赠于阮孝绪以助《七录》。阮氏在《七录》序云：“通人平原刘杳从余游，因说其事。杳有志积久，未获操笔，闻余先著鞭，欣然会意，凡所抄集，尽相与，广其闻见，实有力焉。斯亦康成之于传释，尽归子慎之书也。”<sup>①</sup>表现出齐梁藏书家健康成熟的良好精神品质。萧梁父子及刘勰、钟荣等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基于丰富的藏书利用，其中以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和刘勰的《文心雕龙》为代表。祖暕还据刘孝标《文德殿四部书目》另加《术数》成《五部书目》，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唯一的科技文献独立类目。此外，齐梁的藏书还有赐书、赠书和佣书业等文化活动<sup>②</sup>。

### 三. 齐、梁朝社会思潮的多元特征与藏书文化

南朝社会思潮儒教、佛教、玄道并存的多元思想格局也极大的推动了齐、梁朝文化（包括藏书文化）的繁荣发展。刘宋至齐梁，由于寒人军事贵族在上升为王权强势政治并极度膨胀的过程中，不断对士族世家进行打击排斥，实际上，士族世家已是政治上的弱势群体，逐渐嬗变为寒人王室政权的附庸。他们再没有两晋时期显赫傲人的政治资本，也没有沉溺清淡的闲情逸致，所承接的魏晋士族玄风，由对名士的崇拜转向对才性的崇拜；由哲学思辨倾向于对山水自然的心灵抒发。虽然玄学仍旧是文化士人学习的内容，也不乏玄道著作涌现，但是玄风已日趋平静，儒学开始回归了。齐永明时期，王室几次下诏兴学，推重儒学大师刘歆和沈士麟。王俭、范缜、司马筠等很多齐梁儒士都师从儒学大师沛国刘歆。《南史·王俭传》载“俭弱年便留意三礼，尤善春秋，发言吐论，造次必于儒教，由是衣冠翕然，并尚经学，儒教于此大兴。”<sup>③</sup>。至梁代，梁武帝“高祖践阼，尊重儒术，”<sup>④</sup>天监四年，置五经博士，“广开馆宇，招内后进。”“十年间，怀经负籍者云集京师。”分遣博士祭酒到郡州立学。天监七年，又颁诏：“建国君民，立教为首，砥身砺行，由乎经术。”<sup>⑤</sup>儒学在梁代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南朝儒学的回归，也不再是两汉繁琐的注经训诂，而是强调“礼”的重构。齐梁王室一直期盼通过汉初

叔孙通制礼仪安朝邦式的手段，在“礼”的规范下，建立和巩固强有力的王权，结束战乱和无休止的权力争斗，构建一个有秩平稳的社会。据《南齐书》、《梁书》、《南史》三部正史记载，齐梁文化士人和藏书家（齐梁藏书家几乎都是文化士人）传记里都有“博通儒经，尤精三礼”相关词条。《隋书·经籍志》记录了大量的齐梁注《礼》著述。齐梁人将王弼注取郑玄注代之，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思潮与文化倾向——儒玄合流。儒学的回归还再于文化贵族试图通过家传世学对儒学的吸收或发挥，挽回没落的家族，同时也显示自己优越的文化地位。如王俭、王僧虔、王僧祐、王僧孺、褚渊等。对于寒士文人来说，儒家的入世精神无疑是支撑他们入仕的乌托邦，他们的人生道路唯有与儒家文化所昭的君臣之道相结合才能有所归宿<sup>⑥</sup>。如刘勰早年依托沙门，研习佛理，编撰佛经目录。儒家的积极入世精神使他不肯沉溺，负籍自荐于沈约，以文学批评巨著《文心雕龙》展示世人。儒礼之学便成为一些寒士入仕的途径。如沈峻“家世农夫，至峻好学，与舅太史叔明师事宗人沈士麟。在门下积年，昼夜自课，日重则杖自击，其笃志如此。遂博通五经，尤精三礼。”<sup>⑦</sup>儒学的回归又产生了大量的儒家经典注解及义疏文献，确立了藏书目录分类学，儒家经典列于部首的地位。此外，偏重文史辞赋之才也是齐梁文化的主要价值取向，也是南朝选官的主要标准。“二汉求士，率先经术，近代取人，多由文史”<sup>⑧</sup>士人的价值观念与知识中心也由汉儒经学转向玄学，再向文史辞赋之学。但是这些都建立在儒家文化积淀的基础上，与儒礼入仕相补充。南朝齐梁二代文学、史学发达，诗赋文集众多，编集之风至萧梁尤盛，文化士人几乎人人有集，而且往往一人多集，文学巨著也菁华毕出。私家撰史蔚然成风，史学相当发达。据对《隋书·经籍志》史部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史籍达874部，1.6万卷之多。文学、史学著作的大量涌现而独立成类，为后世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奠定了基础。同时，南朝已经完成了外来典籍佛经翻译的大体工作（限于篇幅，齐梁佛教藏书文化不在此论述），在思想文化上佛教已步入了援儒入佛，援道入佛的过程，建立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亲和关系，得到了中国主流文化的认可和接纳。同时，南朝已经完了外来典籍佛经翻译的大体工作（限于篇幅，齐梁佛教藏书文

术技录。外篇：佛法录；仙道录。

- ① 汪辟疆《目录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 ② 见陈德弟《魏晋南北朝私家藏书兴盛的原因初探》，（《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1），详尽评述了魏晋南北朝赐书、赠书和佣书业的藏书文化活动。
- ③ 李延寿《南史》，卷22，《王俭传》，第595页。
- ④ 姚思廉《梁书》，卷48，《何佟之传》，第664页。
- ⑤ 姚思廉《梁书》，卷48，《儒林传序》，第662页。

- ⑥ 查屏球《从游士到儒侠——汉唐士风与文风论稿》，第204-229页。
- ⑦ 姚思廉《梁书》，卷48，《袁峻传》，第678页。
- ⑧ 李延寿《南史》，卷33，《王僧孺传》，第474页。

化不在此论述),在思想文化上佛教已完成了援儒入佛,援道入佛的过程,建立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亲和关系,得到了中国主流文化的认可和接纳。儒、佛、玄道相互汲纳改造,形成了蔚为壮观、精深博大的中国传统文化。这些都为齐梁藏书文化的繁荣提供了社会人文环境和思想基础。

#### 四. 齐、梁朝藏书文化繁盛的原因及启示

齐梁文化在短暂的 70 余年间,取得了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空前的文化成就。究其原因,一是魏晋以降,出现了占据社会主流思潮并且富寓思辨精神的魏晋玄学,从而把人们从汉儒封建礼教禁锢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自由、张扬的人性得到畅发,“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sup>①</sup>成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人文精神特质。二是南朝齐梁之间,魏晋玄风渐静,儒学回归,佛教中土化。儒、佛、玄道三教并存的多元社会思潮格局,客观上有利于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三是齐、梁朝传承魏晋文化,并形成了文化贵族、王室贵族、寒士文人三个

文化实体,他们之间的文化宽容与良性互动,极大地推动了齐、梁藏书文化的发展。四是这一时期纸张作为文献媒介载体的改良与广泛运用,导致了书籍史上的重大变革,从文献物质载体上奠定了齐、梁朝文化繁荣的基础。但是,我们也清晰地看到,如同整个南朝,齐梁王室权力争阉,无情杀戮,官制腐败,外族入侵造成了南朝政治黑暗和社会极度动荡,给藏书文化事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书厄悲剧不断。齐末兵火延烧秘阁,刚聚集的图籍又遭受重创;侯景之乱,不仅使京都建康公私图籍一时散乱,而且像祖皓(祖冲之曾孙)之流的文化士人惨遭杀戮,南朝科技世家从此无以为继;北朝西魏入侵,导致梁元帝“咸自灭之”,江陵 14 万卷图籍化为灰尘。作者试图挖掘和整理齐、梁朝藏书史料,并通过对齐、梁朝藏书文化与之相联系的社会文化思潮的评析,进而揭示这一特定历史时空中蕴含的人文思想所具有的超历史意义,也许这样更有助于我们对古代藏书历史主体的认识。正如明代藏书家胡应麟说的“观此图籍废兴,大概关系国家气运,岂小小哉。”<sup>②</sup>

#### Comments On Qi And Liang Dynasties'Book Collection Culture

LIAO Ming-de

(library Shaoguan university,Guangdong Shaoguan512005,China)

**Abstract:** Under advocate and practice of royal political power and culture scholars,Qi And Liang Dynasties'Book Collection Culture supported with literature historiography each other. Its push development of ancient times'Collection Book Culture forward enormously. In the idea field,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Metaphysics aided and existed in the mean time,and formed many kinds of social ideological trend patterns. And also,Its provided to favorable social civilization circumstances for Qi and Liang Dynasties'Book Collection Culture.

**Key words:** Qi And Liang dynasties; Book Collection Culture; humane spirits; comment

(责任编辑:石磊)

① 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77页。

②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第12页。